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八一期 ——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12d)

【百家争鸣】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兼与作者商榷	袁笠翁
【知情者说】	毛泽东和江青二三事	阎长贵
【史实辨析】	“四人帮”余党马天水在上海接受审查	陈锦华
【文革疑云】	康生签署的一份秘密处决令	王学亮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百家争鸣】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兼与作者商榷

• 袁笠翁 •

传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以下简称《难》)是近年来难得的好书。于是路过香港时，特意购而读之。据总序称，作者是“有深厚功底、又长期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专家。”“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及市县档案资料馆，搜集整理档案并对史料辨伪。”其重要特色是“史料之丰富、辨析之充分”(《难》总序，金观涛)。但是通读全书之后，笔者大失所望。书中不仅史实性错误百出，而且所持立场未脱大陆官史的窠臼。独立写作，自由出版等有利条件，带来的却照样是官史中常见的老问题，这不能不让人想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古语。下面，笔者试从史实和立场两个层面，谈谈看法。

一、关于史实

判断一部史书之高下，首先要看它如何对待史料，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如何对待权力制造的官方言说。简言之，就是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历史真实。《难》存在的问题是，

第一，它对某些史料的运用过于轻率；第二，它的某些判断缺乏根据；第三，书中存在着一些常识性错误。下面分别述之。

第一、关于某些史料的运用

A.《难》第三章第二节，谈到毛泽东在考虑张春桥作接班人时，张的“叛徒历史”成为事情的焦点。为了说明周恩来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作者引用了邓小平之女毛毛的回忆：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和其夫人卓琳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向邓小平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第188页）

笔者认为，毛毛的这一回忆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依据周恩来小心翼翼的性格特点，特别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在场，周提起如此敏感的话题是不太可能的。其次，邓此时刚刚复出，和周的交往甚少，甫一见面，周就同邓谈此事，其可能性更小。如果考虑到毛毛写的另一次陪同邓小平去看康生的情况，则完全有理由认为是毛毛把两次事情记混了。（详见 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New York, p73-74）

《难》还谈到，1974年12月23日毛、周会谈，周恩来又对毛谈起张春桥的叛徒问题。作者的根据是《周恩来年谱》：12月26日，毛泽东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笔者认为，这一证据同样不可信。理由有四：

第一，年谱并没有告诉读者是周还是毛先提起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第二，根据《周恩来年谱》，毛不仅提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而且向周夸奖了张，说张有才干，要周向政治局传达。周还传达了毛的如下讲话：“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2—1715页；又见，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New York, p234；《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1974.12.23—1975》。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这些史料只证明了一点——毛对张春桥极为信任。

第三，毛泽东、周恩来对张春桥历史问题的态度亦可以从陈永贵身上得到启示。陈永贵在1968年承认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当有人质疑陈永贵没有资格作九大代表时，是周恩来根据毛的意思把此事压下。（见范银怀《“汉奸”陈永贵是如何过关的？》，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5期；范银怀在文中引用了《谢振华回忆文集》中的一段话，谢振华说他写了向上反映的经过和自己的看法：“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被发现以后，于1968年9月，我即派当时出席‘军工会会议’的李金时（六十九军副军长）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遵照周总理指示，1968年12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我又当面向他作了请示。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仍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后来，周恩来还提名陈永贵为副总理！（霞飞《劳模领导人陈永贵与四人帮的恩

怨》，载《党史纵横》2005年第2期）鉴于以上几点，笔者认为，在明确知道毛对张的看法的情况下，周不可能向毛主动谈此事。

第四，张春桥是毛的红人。林彪想打倒张都办不到，以至于庐山成了名副其实的“折帅山”。九届二中全会后，风向转变，周恩来竟然递条子给林彪，要求表扬张春桥。林彪对周的提议置之不理（见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813页）。张春桥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身兼两职，既是七人批林批孔领导小组也是六人军委小组成员，红得发紫。一向善于揣摸毛泽东心思的周恩来，竟会在此时“阻止”毛重用张，是有悖情理的。

笔者认为，《难》对周恩来与张春桥之间的矛盾斗争做了违反情理的夸大处理，作者之所以做此选择，完全是因为其思想理念仍旧束缚于“两条路线斗争”这一既定的思维框架之中的缘故。

B.《难》第203页写道：1973年3月29日，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重要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这一说法有误。根据《周恩来年谱》，并不是“重要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讨论”，是“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换言之，是有关外交的政治局会议，邓小平有资格参加，而非一个大而化之的“重要问题”，两者的区别可谓大矣。实际上根据现有记载，邓小平在1973年年底以前在政治局的活动是非常的少，以至于在《周恩来年谱》中毫无记载。

C.《难》第206页写道：“1970年9月的庐山会议上，多数中央委员不明真相地要求设国家主席，王洪文自然坚决地站在张春桥一边，立下了功劳。”这一说法同样有误。实际上，当时王洪文在一开始也是积极响应林彪讲话的。王洪文当时大喊大叫，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当事人张佐良说：“我还在奇怪，现在也不是‘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时候了，怎么还喊这样的口号？难道有谁反对毛主席吗？”（见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11页）

D.《难》第222页说，“毛泽东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未担任过中央军委要职的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说明毛泽东把最重要的军队权力交给他掌管。”这一说法同样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此时的邓小平并没有出任总参谋长一职。虽然12月15日毛泽东提了一句“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但《周恩来年谱》和1973年12月22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通知》，都没有提及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一职。《通知》只是说：“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根据曾庆红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附卷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1949.10—1997.9）》中的介绍，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一职为1975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1975.01.05；中发〔1975〕1号），邓小平确实是在1975年1月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

至于说，毛泽东把最重要的军队权力交给邓小平掌管更不符合事实。根据《周恩来年谱》，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20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此建议时，将原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并确定军委六人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报主席或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达”。同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邓小平不仅排列在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之后，而且在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

对于运动的走向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详见 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New York, p178-186）

E.《难》第13页写道：“九一三”事件10天之后的9月23日毛泽东再次要汪东兴追问（黄吴李邱的问题）时，周恩来才吃惊地拍案惊呼：“我忙昏了头，忘记了！”作者认为：“这样的大事，记忆力过人的周恩来是不会忘记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周恩来知道，由于林彪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肯定会有很多军队将帅甚至中央领导人和他有工作上、私人关系上的往来文字材料，未必都是上了贼船，而一旦这些都被列入罪证，中央专案组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必定主张追查株连，将会罗织更大范围的冤案。因此，宁可冒险纵容黄等人一烧了之。”

首先，作者并没有给出“周恩来才吃惊地拍案惊呼：‘我忙昏了头，忘记了！’”的材料出处。根据“九一三”到9月23日之间中央以及周恩来的活动，周恩来没有忘记。李德生就是在这期间奉周恩来的命到黄吴李邱的住处了解情况，事后向周恩来做了报告。（见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30页；又见，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39页）

据《周恩来年谱》，9月14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周恩来在9月24日讲：“限你们十天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这才是到24日才处理黄吴李邱的根本原因，是毛决定给黄吴李邱等人的表现时间，何来的周恩来故意保护一说？

同样依据《周恩来年谱》，9月14日，（毛泽东决定），参与林彪政变阴谋活动的人员，均在后来清查中逮捕归案，有关罪证材料由周恩来审核后送毛泽东。9月30日，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彪反党集团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经报毛泽东同意，10月3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和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的通知。

文革中，周恩来不仅主持整个中央专案组的会议，而且从文革一开始的中央专案委员会以及以后的中央专案小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本人，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整个专案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于毛泽东、林彪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至于材料的是真是假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是否能满足组织的要求。（详见：1, 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82; 2, 毛泽东对于专案组的批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邓小平材料的报告及毛泽东批示》，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3, 关于林彪的作用和态度，林彪只是毛泽东划圈我划圈，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4, Schoenhals, Mike,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5, May, 1996, p90;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统一，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697—699页）

因此，上述说法，要么是作者的一厢情愿，要么纯属作者的主观臆测。周恩来本身与军委

办事组联系甚多，他就不怕承担别人的指责，销毁自己的罪证吗？在《难》的作者看来，不是有一直对周恩来虎视眈眈的“四人帮”吗？

依笔者理解，《周恩来年谱》所言毛说“给黄吴李邱十天时间交代”云云，也是子虚乌有，那不过是逮捕黄吴李邱的一个借口而已。毛想抓，周就会去抓。文革中，还不是毛想抓，而是江青想抓的，周恩来不也去抓了吗？

第二，关于某些判断

《难》如官史一般，对于某些事件或是照本宣科，或是妄自断言。此类情况多多，笔者只能列举其中几例：

A.《难》第28页断言：“虽然历史证明，……‘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搞的”。不知道作者做此断言的根据是什么。“二月逆流”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毛一手操纵，而且事情错综复杂，把它说成“主要是江青搞的”是违反基本史实的。（见欧阳龙门《林彪在“二月逆流”前后》，载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312页）

B.《难》第112页断言：中美关系的缓和，三线建设重点的转移对于国内支持备战的林彪集团是一个打击。试问，国内备战是林彪集团搞的吗？支持备战是林彪集团一家的事情吗？书中对林彪集团的认识同国内官史毫无二致。战备，当时是国内领导层的共识。（详见余汝信《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载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第312—353页）作者在书中特别喜用“林彪集团”或者“四人帮”一词，但是真正存在这么一个“林彪集团”吗？如果“九一三”后毛泽东打倒黄吴李邱，作者就认定此四人就属“林彪集团”，这个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三线建设早就展开，甚至早于文革，难道那时就存在一个林彪集团吗？文革前及文革初期，林彪得到军内广泛拥戴，老帅们都支持林。叶剑英更是林的得力助手，用作者的思维，叶难道不属于这个“集团”吗？这其实是作者一个典型的固有思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两案”审理前后的时代，没有丝毫前进。

C.《难》第115页断言，与江青相比，张春桥和姚文元是坚定的反西方派，时时在中美关系缓和的问题上，施放攻击周恩来的冷箭。对于此种说法，书中并没有给出证据。在中美关系上，所谓的激进派并没有指手划脚。毛泽东在1973年11月为外事问题批周后，甚至说“让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学点外文，不要上别人的当”（纪东《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载《纵横》，2008年第2期），等于是要他们插手外交，但后来也并未见到二人照办。

D.《难》第196页断言，周曾经多次以“叛徒”和“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来阻止毛重用张春桥。周的多次从何而来？《周恩来年谱》和作者的论述告诉我们，只有一次。

第三，某些常识性错误

《难》第30页：1973年2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接着，作者告诉人们，张春桥既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

这里有个常识问题：

第一，不存在一个1973年2月29日。

第二，当时在场的不仅有张春桥，还有邓小平。（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6期）如果张春桥有责任，那么邓小平要负哪些责任？在毛没有明确指示给贺龙平反的时候，无论是张还是邓均无可能着手为贺平反。向陈毅传达“二月逆流”之事就是明证。（见《“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辑》，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第35页；范硕《二月抗争前后的周恩来》，载《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21期）另外，《难》书第54页，胡愈之、萨空了等人是中共党员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作者还称之为民主人士，不知道依据何在？

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

二、关于立场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追求“客观公正”，因此，史学家在面对历史人物和事件面前，要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遗憾的是，《难》和作者没有做到这一点，作者无法超然，作品自然就难以客观公正。

第一、偏见

如官史一样，《难》禀持着仍旧是“好人办好事，坏人办坏事；好事都是好人办的，坏人不会做好事的”的观念。这一点在对周恩来的评价上至为明显。

例如，作者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谈到，针对当时的公安部大批人员被怀疑为特务，周恩来气愤地说：“公安部把所有局长的权都夺了，只剩谢富治一个人，还怎么做工作？这是剜心战术。”（第43页）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请见证据——

1、1967年8月21日，周恩来对《七机部军管会的指示》中说：“政治部和公、检、法不是一个系统，政治部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如果要砸，要劝阻；劝阻无效由他们负责。要劝说“新九一五”的同志不要管，千万不要武斗。政治部的领导干部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不要砸。”（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周恩来的言外之意是，公、检、法是可以砸的。

2、1968年3月18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就讲：“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伸向浙江的黑手一个个揭发出来，砸烂公检法，文教战线上许多坏事要改造。”（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

3、根据余汝信先生的记述：1968年4月1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报送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主要内容就有：深入开展大批判，截至目前止，共挖出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重点分子101人，逮捕22人，群众看管79人，其中包括7个副部长级干部。指称罗瑞卿、徐子荣、汪金祥等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资敌通敌，里通外国”，“把黑手伸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继续批深批透，批倒斗臭；四是建议由军队调来的曾威（军级）等四人组成审查清理档案小组，以曾威为组长，再从军队中选拔150人，担负审查清理档案的任务。对这个报告，周恩来并没有表示异议，并转报毛泽东及中央批准。

4、1971年6月，周恩来否决了公安部部核心小组要求新设立中央政法干校的要求。李震重建公安队伍的积极态度不是比周恩来更可取吗？（见余汝信，《1973：李震之死始末》，《华夏文摘》增刊第376期，文革博物馆通讯，213，2004年4月19日出版，文件名zk0404c）

此类事例多有，笔者不一一列举。在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对公安系统工作的多次诋毁。然而作者在把谢富治描述成一个恶人的同时，把周恩来塑造成一个维护公安系统的楷模，这是有违于史实的。

实际上，毛泽东在1967年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08页）“砸烂公检法”正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作为执行毛泽东文革政策最得力的助手，周恩来自然对此是坚决执行的。值得注意的是，《难》“为尊者讳”，远不止上述一事，作者的对周恩来的曲意呵护在书中随处可见。

官史承认周恩来在文革中说了不少违心话，办了不少违心的事。而《难》的作者连官史还不如，居然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表现的‘右’、保守。”（169页）笔者不知道作者依据何种资料得到这个结论。资料证明，周恩来是有右的地方，但是也有左的地方。究其本质，周恩来是执行毛的政策最得力的助手，不仅是在毛右的时候，也在毛左的时候。（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New York, p12–25; 郭思敏主编《人民总理周恩来》下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771页）然而有时候周在执行的时候并不知道毛的底线如何，于是在试探毛的时候，不免会表现为极右或者极左。例如，1966年6月份，周恩来指示干部要引火上身。随后不久，毛泽东提议所有干部都要在运动中表演一下。于是在李富春主持的、陶铸抓的、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都参加的会上，搞出一个“司局级以上干部都要烧一烧”的会议纪要。周恩来阅后，批示到：“我看这个文件很好，请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关锋在此文件上批：“我看这个文件不好”。王力说：“我是不同意提出干部都火烧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和王力五人联名对此文件表示了异议。毛泽东批示此件不发，退文革小组。（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981页）当“9·13”之后，毛发现很多人反对文革，需要借纠左来巩固文革时，周在执行的时候并不知道毛的底，也只能试探，当把触角伸向教育思想等敏感领域时，也就被毛制止。（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New York, p56–60, 111）

对于王良恩之死，明明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者却丝毫不敢提及，相反用大量的笔墨痛斥江青等人（第314—316页）。笔者认为，造成王良恩之死的关键证据，作者是知道的，但是作者却以“为什么当初林彪会把信扣押下来，他确实不清楚”来为周恩来解脱。（同上）

8月25日，许世友等三人将信写好之后，委托当时担任华东组记录简报工作的华东组会议秘书洪雪竹交给负责大会会务的王良恩，请王良恩转呈毛（赤男《林彪事件后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王良恩接到这些信后，按程序上交给周恩来。然而周恩来却把此信转给叶群，并附条子，到此为止，存你处。（见《舒云采访邱会作》一文，载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第121页）江青的威逼，众人的揭发，落井下石固然是王良恩自杀的主要原因（见丁凯文《王良恩是林彪死党吗？》，载《重审林彪罪案》，明镜出版社2004年，下册858—867页），但是作为对此事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却未施援手，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解释，这也是王良恩绝望的主要原因之一。周恩来为什么不说明他给叶群写的条子呢？

作者对于周恩来的失实描述还在于很多地方，再举一例。第112页“周恩来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几天内旋风般地周游各国将这一情报通报仅有的几个铁杆兄弟”。作者以此来证明周

是支持中美建交的。实际上，每次毛的主张要落实，周都是“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例如作者提到当周得知张再的文章引起毛的震怒时，周也是立即行动起来。这个积极性只能说明周对毛的命令的执行很快速，并不能表明其他问题。

与对周恩来的呵护备至，褒扬有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对于“四人帮”的明显偏见。

《难》书第40页，作者将1970年的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完全归功与周恩来，这是充满偏见的行为。因为无论文章是好是坏，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是张春桥。而作者对张春桥的作用完全熟视无睹。

《难》第41页，作者竟然用“江青集团更是愤愤不平”来形容，但是同页却又指明了张春桥对此事是拥护的。且不论当时的王洪文还不是后来所谓的“江青集团”一分子，更不用说马天水了。更重要的是，江青对此事到底有何反对之举，作者并无证据。而且因为邓小平复出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反对江青，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如何在1973年的3月9日就开始表示反对了呢！（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New York, p72 作者访问国内研究邓小平党史专家，2002年11月。作者反驳了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的说法——邓小平复出遭到了江青等的反对。笔者认为在毛泽东已经拍板的情况下，江青等是不可能反对的。）

《难》书第184页，作者根据江青在批周会议上的表现，断言：“毛的态度和‘四人帮’上纲上线打倒周恩来，是不同的。”姑且不论江青是否真的能和毛分开，此处用“四人帮”是不适宜的（因为王洪文并没有批周恩来）。

毛远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宣称：“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第497页）因此，江青说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毛的意思，而且其他政治局成员也这样认为，叶剑英和李先念就通过汪东兴询问毛。Teiwes 先生采访后得知，毛在批周之前就讲周要夺权，批周之后又问谁想当皇帝？（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New York, p138）因此，12月份的批周会议上，江就是毛的代言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第二、是否存在两军对垒？

此书的一大主线就是第3页所论述的“与前一段时期抵制‘文革’活动总体上是潜在地、被动地相比，抵制、纠正‘文革’路线和坚持维护‘文革’路线的斗争形成了两军对垒。”

笔者认为，此说本质上就是官方所做的结论：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笔者看来，此说夸大了所谓两军的区别与差异，人为地抹杀了两军之间的互动与相互支持。笔者认为，不能用“非黑即白”的处理方式来论述历史。所谓的两军并没有明显界限，他们只是在毛的指挥棒下去演各自的角色而已，在某个时期造成个别人的批判与被批判。

作者首先从周恩来在各个领域恢复政策的努力开始，就意图贯彻周恩来与江青和张春桥等的斗争。（《难》书第38页）

（1）革委会主任被撤职

作者企图用九大之后，山东等四个省的革委会主任被撤职一事，来证明周恩来纠左的努力。然而作者丝毫没有提及毛的作用。我们要问，周恩来真的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事实是，因为九大之后这几个省尚未稳定下来，而毛认为，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应该要告一段落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章）在此背景下，才有上述撤职一事。

《难》第39页强调，刘格平是“1967年被江青看中召见，回省后组织造反派夺取山西党政大权。”事实却是：文革开始的时候，因为地域的关系，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卫恒被毛看作是刘少奇、安子文线上的人。1966年初，中央为了了解情况，将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叫到北京。1966年11月23日，刘格平给毛泽东、林彪、康生写信反映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发表声明出狱，而他本人则如何坚持斗争和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情况。12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刘格平：《对山西省委审查结论的书面意见》1983年3月15日；转引自余汝信、曾鸣：《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华夏文摘》增刊第514期，文革博物馆通讯，348，2006年7月24日出版，文件名zk0607d）

用江青支持刘格平，来衬托周恩来与江青斗争的“光辉业绩”固然不失为一个办法，但是作者既拿不出来江青支持刘格平的具体证据。又无视毛泽东对刘格平的倚重，如此史书，能称得上信史吗？

（2）老干部问题

《难》第42页说，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个300多名的高级干部的名单，周恩来、叶剑英排除江青、张春桥的百般阻挠……”作者并未提出具体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

解放老干部的政策，是毛泽东一手控制的，特别是高层干部。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高层干部如何安排都做了具体的批示。并没有发现江青等阻拦的情事。至于在解放一些干部中，江青等针对于个别人的个别问题提出质疑，也是合乎程序的。说江青“百般阻挠”是夸大之词。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有足够材料证明，在贺龙平反一事上，周恩来是起了阻挠作用的。1974年9月初，毛泽东又向陪外宾来武汉的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并且强调不要再核对材料了。邓小平回京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见《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王福生：《毛泽东与贺龙》，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76—377页；《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632页）而当时主管贺龙“专案”，且负责核对材料的，正是周恩来。

在毛的一再催促下，李仲公的揭发信在9月23日被鉴定完毕，六天后——1974年9月29日，由周恩来亲笔修改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发出。此通知与1982年10月16日的《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相比，平反不彻底。根据《贺龙传》以及《贺龙年谱》的记载，贺龙的主要问题是牵涉到1927年、1929年、1933、19

34年的叛变、通敌问题。而1974年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1927年、1929年的事情只字不提，这正是当时《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所提当时立案是必要的依据。而这些事情又同李仲公的信直接相关。李信正是揭发贺龙1927年和1929年通敌叛变的亲笔信！（安熠辉：《文史精华》2003年，第8期；蒋健：《文史精华》2003年，第11期）根据蒋健先生的分析：李是蓄谋已久，但信显然不是1968年3月伪造的，否则他造假的技术和速度未免也太高太快了，周总理也太好骗了。此信是周恩来一手掌管的。（蒋健：《文史精华》2003年，第11期）

事情非常清楚，李仲公的信为什么早不鉴定？为什么毛强调不要再核对材料了？这不正说明，阻挠给贺龙平反的是周恩来吗？

（3）四届人大的问题

（I）四届人大的推迟到底是什么原因？

从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十大上提出毛泽东要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后，准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始。《周恩来年谱》记载，周分别于9月10日、9月12日、9月14日、10月16—19日参与准备四届人大会议。但是直到1974年的10月6日，周才再次参与四届人大准备活动。根据《难》书的解释，这是因为从11月份的帮周会议导致了四届人大的夭折。

笔者不认同这种说法。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在10月16—1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筹备工作，并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在这种情况下，“帮周”会议是在11月17日开始，近一个月的时间周恩来无任何准备参与四届人大活动，这可能么？事实上是，10月22日公安部长李震的突然死亡导致的紧急突然状况，四届人大才因此而被推迟。（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New York, p187）

亲历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孙中范回忆：10月21日，发生了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公安部部长不明原因身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北京的气氛比较紧张。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这时才弄清楚，中央责成纪登奎、郭玉峰等参与处理李震事件，顾不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大约在11月初，组织组负责人吴庆彤来紫光阁召集值班室工作人员开会。他说，中央最近有些紧急事务需要处理，一时顾不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值班室也就没有事情做。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值班室可以派人轮流值班，平时可以回原单位上班，但不要出差，随时等候通知。（孙中范：《百年潮》2008年，第6期）

作者把批周说成是造成四届人大会议推迟的原因，只是想再次证明“两条路线斗争”泾渭分明，两军对垒无时不在。

（I I）关于周恩来在准备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难》书的作者在这部分的材料取舍上是非常不公正的，并且进行了篡改。第395页，作者无视《周恩来年谱》的实际情况，竟然写道：“1974年12月，在各类代表分配方案产生后，周恩来又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老干部和青年干部，外事和体育的名额。”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在12月14日，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后，致信

王洪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一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审议批准。

二者对比，明显是没有青年干部一项。笔者认为，这种篡改实际上是把周在 11 月份中的提及中青干部（这些青年干部实则为以造反起家的文革利益阶层为主）放在此处同提议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的名额一起，将中青干部的这种造反色彩抹掉，可谓用心良苦。

实际情况如何呢？

周在安排老干部方面远远跟不上安排中年人和依靠造反起家的新人。周在 11 月份给毛写信，表示关键在于中青干部——实则为造反年轻人的提拔，并且支持他们在政府中任职。此信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全文。《难》书在 404 页引用此信的内容时注明资料来源为来自《周恩来年谱》（1974 年 11 月 6 日）。但是两相对比，则非常清楚的显示作者实际上是引用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例如年谱中提及“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里面并无“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这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是有的。

以王海容为例，1970 年夏天，由周恩来直接提名，委任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1971 年 7 月，王海容被正式任命为礼宾司的副司长。1972 年，王海容被提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再过一年多一点，王海容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除此之外，周还提议同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周还特意提拔了一些同毛没有私人关系的人，象祝家耀、邓岗、于会泳等。周催促张春桥和王洪文推荐祝家耀为公安部副部长。邓岗后来作为所谓“四人帮”的死党被整肃。周恩来还推荐于会泳出任文化部的部长一职。（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New York, p219）

然而作者对这些统统不提，把祝家耀等人的事情统统放到“江青集团”的头上，这是客观公正吗？

作者还指责王洪文等借四届人大安排自己的人马，殊不知，周恩来还为此批评上海方面送来的人还不够！（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New York, p223;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p169-171）

作者还在 397 页如此评述：“在此之前，国务院副总理中是没有第一副总理头衔的。这是在医院养病的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并得到毛同意后才设立的，暗示着邓成为周恩来接班人地位。”

事实远非如此。周是第一个提出要设立第一副总理头衔的人，但是周并没有提出候选人。江青则说：“总理比较危险，可能动手术了，他（指邓小平）就跑到我身边说，不得了了，怎么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呀。我说，那还不是你嘛。你们看我蠢不蠢哪。”（《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1976 年 3 月 2 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2002 年版）实际上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没有遇到任何的阻力。

作者还引用《周恩来年谱》上的资料，江青在 10 月 6 日向周恩来提出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周恩来未表态一事来说明“召开四届人大是他们攫取国家最高权力

的最好时机。”且不论当时的中国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毛泽东手里，在中央政治局，而江青的这个名单为什么没有曝光呢？如果说这个名单确实能证明江青要“攫取国家最高权力”！

（I I I）总参谋长

作者在第398页论述：“周派和江派谁能控制总参谋长，谁就占上风。因此文官体系的江青集团特别要拼命争夺。”那么作者眼中的周派和江派分别提出的总参谋长人选是谁呢？

作者提出，江青推荐的杨成武。而对于周派提出的是谁则毫不提及。作者认为江青之所以提杨成武是因为基于杨成武的权威小易于控制，再一个就是进行平抚拉拢。

周派的代表邓小平有提名，提的是陈锡联。周恩来并没有提出任何人选。(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New York, p204; Teiwes Frederick 作者在2005年1月的采访，被采访者看过提名陈锡联和杨成武的档案文件)

如果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进行分析，作者对于江青为什么推荐杨成武的说法还站得住脚么？

邓小平提名陈锡联一点都不忌讳毛一再强调的山头问题，只能说明这是投毛之所好。自陈锡联出任北京军区司令一职后，仕途一帆风顺，在1976年达到顶峰。而江青提名杨成武也是出于同样原因。这在周恩来在74年11月给毛的信中说得非常明白：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两同志改正。周后注9 / 11）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534页）毛选邓则化解了江和邓提名上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符合毛现在的平衡原则。

杨成武被毛看中，对比同一时期的罗瑞卿则看出明显的不同。邓小平对于整肃罗瑞卿表示出一定的保守意见，而杨成武在整肃罗瑞卿一事上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余汝信：《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华夏文摘》增刊第471期，文革博物馆通讯305号，2005年12月19日出版，文件名zk0512d）杨成武在一定程度上是牵制邓小平的一个棋子，也体现出毛对邓的信任度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或许是吸取了林彪事件的教训。而陈锡联则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副总理，预示着进一步的高升。

（I V）风庆轮事件

《难》书在399—405页集中论述了风庆轮事件。作者引用王洪文在1980年被审讯时的供词来证明此事件是意图阻拦邓小平任参谋长一事和“‘四人帮’一开始就打算把矛头指向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风庆轮只是个引子。”

作者引用了大量资料试图说明“四人帮”是蓄谋已久，特别是江青在10月17日逼邓小平表态一事。但是作者只提供了江青等人的背景资料，却没有提供邓小平的背景资料。10月17日发生的事情是蓄谋已久的么？

首先，笔者在《周恩来年谱》或者其他资料看到邓小平在整个批林批孔中并没有对周恩来表示出同情或者是站在周恩来这边。相反的是邓小平却有明确支持批林批孔的记录。早在2月

份，周恩来就建议“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个别领导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政治局同志请小平同志在适当场合批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500页）在1974年3月8日，军委六人小组针对在军队中如何批林批孔召开会议。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在会上猛烈批了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的陶鲁笏。邓小平批陶鲁笏要脱下裤子，要执行江青的指示，从文革中好好学习，积极进一步推动批林批孔运动。（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New York, p181; 作者资料来源为ANU大学，会议原始记录摘要）再加上邓小平在1973年年底批周会议上的表现，江青认为邓小平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这是非常自然的。

其次，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针对风庆轮问题，作为已经被毛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此时还没有表态。江青询问邓小平的态度也是自然的，谈不上什么蓄谋已久。

最后，风庆轮事件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而非邓小平。而此时的周恩来尚没有获得主持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的权力，如果单是指向周恩来，又如何能够影响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呢？况且人事的安排最后还是由毛一手决定。

事情的发展则是毛泽东对于风庆轮认为是小事，不值得大惊小怪。风庆轮所能够带来的仅是江青偶然和邓小平的冲突从而让毛认为江青等人并不能够理解自己的战略安排一要和邓搞好关系，为此王洪文在毛看来是不能够承担大任。这就是江青所始料不及的事情。反过来，后来，邓小平去找了江青。对此，毛表示支持邓。（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New York, p216）

而且根据事实上发生的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情况，把风庆轮看成是江青等把“矛头指向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也是毫无根据的。

（V）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难》书在406页继续了一贯的腔调：周恩来和邓小平、李先念多次研究，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而文化部、体委则可做些妥协，便对江青一伙让步，同意了于会泳任文化部长。以至作者最后还提出“如果在毛泽东当时严厉批评‘四人帮’利用四届人大组阁阴谋之时，周恩来能利用这一时机和他的重要地位，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态度和果断措施，而不仅仅是限制他们的权力，‘文革’岂不是破产更快，党和国家不是少受损失吗？”（第408页）。

风庆轮事件之后，周恩来劝说邓小平找江青谈，要搞好关系。根据后来江青的叙述，虽然有分歧，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New York, p181; 《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3月2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

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力提出候选人名单，难道江青等人的提名就是夺权？

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主持1974年12月21日政治局会议，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第二方案，并送叶剑英、邓小平及江青、张春桥等阅。

张春桥在11月20日就被毛任命为第二副总理（仅次于邓之后）。而主管文化和教育恰恰是张春桥的分工。尽管江青在1个月以前写信给毛表达自己的意见，提议迟群为教育部长。但是在12月21日，江青等人并没有针对教育部长一职提出任何候选人。相反，在12月毛周会见的时候，周是带着未定意见向毛泽东提出是迟群还是周荣鑫为教育部长。毛泽东否定了迟群。（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New York, p227–228, 作者采访国内党史专家 2005年1月；傅颐：《百年潮》2002年，第2期）

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文化部不比教育部更重要。根据《周恩来年谱》，1970年3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设立国务院文化组问题，周恩来提议吴德为组长，刘贤权为副组长，石少华等七人为组员。当四届人大来临，周恩来询问江青、张春桥关于文化部部长人选意见的时候，江、张提议吴德而非于会泳！（朱元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中国当代出版社 网络版）但是吴德坚决推辞，此时的于会泳是吴德的副手，而且自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以来，于就在周领导下工作，为文化组组员之一。虽然吴德推荐刘大杰，但是在吴德拒绝出任之后，是周恩来提议于会泳为部长，而这导致了江的极度不满，并拒绝向于会泳祝贺。（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New York, p229–230）

因此，所谓的“四人帮”利用四届人大组阁阴谋之说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更谈不上周恩来可以粉碎“四人帮”了。

因此笔者认为：文革中根本不存在周、江两个阵营的对垒。笔者有足够的证据能表明，周、江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相当一致，都是在毛的旨意下行事，所不同点在于采取何种形式予以完成。周江在所有重大的根本问题上没有重大冲突，相反，双方的配合相当良好。周恩来不仅是在工作上，就是私生活上对江青也是特别的照顾。

除上所述，笔者对于《难》中叙述的（1）批左和批右的冲突以及（2）邓小平的复出和周恩来的关系；（3）批林批孔运动等问题都有不同看法。限于篇幅，暂且打住。

□ 原载《记忆》 第八期、第九期

~~~~~

【知情者说】

毛泽东和江青二三事

• 阎长贵 •

—

在“文革”期间，江青主要住在钓鱼台，有时也回到中南海丰泽园住几天。在丰泽园住的时候，有位名叫赵鸿安的服务人员（管理毛泽东衣服什么的），他是山东人，我们是老乡，年龄

跟我差不多，待人很热情。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毛主席跟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讲：“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我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的，心想：在数亿人口中，有几人能直接为毛泽东服务？“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毛泽东这热情亲切的话语，对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该是多么大的鼓舞！

我听到赵鸿安这样说，心里很高兴、很感动。但我当时并没有问他，这话是毛泽东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讲的，跟谁讲的。后来，经过进一步了解才搞清楚。事情是这样的：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江青去杭州，毛主席也在那里，江青恶狠狠地对服务员张素兰说：“组织派你来给我服务，你惹我生气，你给我滚！”张素兰心里很委屈、很难过，气得跑到西湖边上直哭，周围同志怕她一时想不开，会有个三长两短，便把她找回来劝她，安慰她。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对这种情况也看不下去，她很同情张素兰，便把这事报告了毛泽东。说实在话，也只有毛泽东的亲人才敢这样做，其他工作人员是不敢这样做的。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后，便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值班室来了，很亲切、很和蔼地跟张素兰说：“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看到毛泽东来了，并说了这样客气的话，这是小张以及在场的护士许春华谁也没想到的，真是又感动，又不安：毛主席处理党和国家大事，日理万机，还要为我们的事情分心。她们都是20岁左右的女孩子，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手足无措，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向毛泽东表示：我们一定听主席的话，好好为江青同志服务。毛泽东说：“谢谢你们了！”并一一与她们握手，微笑着离开了值班室。从此，毛泽东“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这句话，不仅成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强大工作动力，而且也成了化解为江青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郁闷和不快的宽心丸。

## 二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穷苦人出身，不是农村贫下中农，就是城市贫民或者工人，比如她的护士许春华还是一个孤儿，对党、对毛泽东都有深厚感情，都懂得没有党和毛泽东就没有自己的翻身解放。事实上，按照当时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没有这个条件，也不可能被选到毛泽东家里工作。人人都为有这样的机会而高兴、自豪。就工作讲，人人都是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不能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江青如果说谁不给她好好服务，那完全是昧着良心瞎说。我们工作人员之间，也互相关心和爱护，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地做好江青的服务工作。一个人受到江青的批评、斥责，大家心里都不好受。我们工作人员之间相处得很和谐，有说有笑。给毛泽东做过13年卫士的李家骥说，“我们工作人员之间真是‘互相帮助’”，“有如兄弟姐妹一样的感情”。此言非虚。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之间也是如此，我们也都有这样的感觉。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这儿的气氛和外面机关也完全不同，非常严肃、紧张、神秘。上下班，每天看到的，都是那么几张脸。可大家互相见面时，又都是彬彬有礼、微微地点点头，既没有时间交谈，也不敢交谈。因为这里有个规矩，谁也不许打听别人的事。更不允许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几乎都是把嘴封得严严实实的，个人都是默默地做着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像按照严格的操典，连脸上的表情，也有一定的样板。”这并不是事实。说这里“严肃、紧张、神秘”，以及各自“都是默默地做着自己分内的工作”，这是事实；说工作人员之间不能交往和交谈，并不是这样。林青山在书中还说，江青嘱咐我：“有件事，你要注意一下，凡是听到你周围的人，有谁议论我什么，你都要立刻向我汇报。这也是你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林青山瞎编的，江青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布置过这样的任务。据说，后来有极个别工作人员好向江青打小报告，其他工作人员对他很反感，直到今天谈起他，大家还深恶痛绝。这是同志之间相处很值得注意的一条经验教训。

我谈几件反映我们工作人员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

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师傅，是工作人员中年龄最大的。山东莱州人，1926年生，中等身材，国字形面庞。年轻时起开始学习烹调，后在铁道部专列上任厨师，技艺精湛，毛泽东乘专列外出时，给毛泽东做过饭。1956年，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武昌鱼”就是程师傅做的。程师傅是1961年借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做的饭，江青很爱吃，很合江青口味。从1961年起，专任江青厨师，一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共16年。程师傅除了兢兢业业给江青做饭外，对我们工作人员也很关心、很爱护，大家也都对他很尊敬。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她吃，并很爱吃；老母鸡她只喝煮的汤，鸡肉不吃。程师傅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多次吃过这种肉，这在生活水平不高的六七十年代是很不错的享受。

程师傅作为老大哥，我们心里有什么话也愿意和他说。有一次江青正在准备午睡的时候，我收到一份急件（内容记不起了），就马上送给她看，希望她能在午睡前看一下，以便急速下传。当我走进她卧室，看到护士正帮她脱衣准备睡觉，我说：“江青同志，有份急件请您看看。”她不接文件，却说：“我正要睡觉，你进来干什么？”我不敢辩解，也不敢立即退出来，过了一会儿，她又恶狠狠地说：“你放下吧！”我放下文件马上走开，心里觉得很委屈。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程师傅，程师傅觉得好笑。他跟我说：“老太婆了，别管她！”1967年，江青52岁，比我生母的年龄还大。所以，程师傅听我讲这件事，他觉得江青的说法和做法有些好笑。读者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心里话，我们都能互相倾诉，这表明我们互相是很信任的。如果不是这样，不论他还是我，把这件事反映到江青那里，那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事实上，我们谁都不会去这样做。顺便说一下，程师傅在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是唯一善始善终的一个，从总体上说，江青没找过他的茬，也没欺侮过他。我看，这也反映了江青的实用主义，大概她觉得，不论秘书、护士，都可以换，唯独做饭适合她口味的厨师，不好找到合适的人替换。

1967年夏天，我爱人因身体不好，来北京看病，住在钓鱼台北门外警卫连的家属宿舍。我们一起工作的同志，都很关心她，结伴去看她。三位警卫战士刘真、王振荣、李仁庆，除了替我陪她到医院看病，还不断地给她送些蔬菜，什么豆角啦、西红柿啦等，这些菜都是他们几位在江青所住的十一号楼门前的一小块地方种的。就是因为这样，我爱人1967年来北京看病时，从几位十分友好、十分可爱的警卫战士那里，得到不少益处。现在他们虽然都还在岗位上，但也都是60多岁的人了。特别可贵的是，现在我们之间仍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 三

特别值得提出和感谢的是江青的护士许春华，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许春华是一个孤儿，卫生学校毕业。人既长得漂亮，又精明，也很得江青喜欢。因为她随侍在江青身边，和江青接触时间最多，因而对江青的脾气和性格了解得也比较透。她不止一次地悄悄跟我说：“你注意点，江青疑心很大！”这是何等可贵的提醒啊！虽然她讲得并不很具体，但也足够我用的了。我后来之所以被江青诬陷、关押，其重要原因之一，恐怕就和对她的“提醒”体会不深，注意不够有关。后来，许春华还跟我说了江青对我的看法。她说：“江青说你是书呆子，有时呆得好笑，有时呆得可爱。”江青具体指什么，她没说，我也不好问。说实在话，当时我对江青是很敬重的，对她没有丝毫的“设防”。就是许春华提醒我“江青疑心很大”，实际上也没有引起我多大的注意。

对江青的历史，开始我一点也不了解，受陈伯达、戚本禹等人吹捧江青的影响，以及江青本人也跟我谈过她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当时我把江青也是看作革命前辈的。为了更好地为江青服务，我努力了解她的历史，我从图书馆借来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看了她在20世纪30年代演电影的情况，看到她饰演《王老五》中女主角的剧照，我还推荐其他同志看——不知道



这是否犯忌。我曾向江青建议不要称她为“旗手”，她也欣然同意。而在江青看来，这是否属于“书呆子”之见？我承认我自己是“书呆子”，但江青所指是什么，并说“有时呆得可笑，有时呆得可爱”，我始终未能理解。现在，我问许春华，她说：说你是“书呆子”有印象，但具体指什么也说不清楚了。

许春华为江青服务六七年，我被隔离、关押后，她受我牵连，也被江青赶出来了。好在得到汪东兴和毛泽东的保护，她未被关押，而被安排去支左。后来，她又上大学读书去了。现在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还经常在一起聚会。

□ 《党史博览》 2008年第11期

~~~~~

【史实辨析】

“四人帮”余党马天水在上海接受审查

• 陈锦华 •

《中外书摘》2008年第9期刊登的《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文介绍称：“据我所在的法庭所知，‘四人帮’被粉碎第二天，马天水就被中央通知去北京‘开会’，从此再未到上海。‘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在北京被捕的。这是马天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原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王文正口述、沈国凡整理的《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一书。鉴于这段历史涉及主要人物、地点的重要性和该书作者工作岗位的权威性，特将我的亲身经历和我所知道的情况写出来，以证明粉碎“四人帮”以后，马天水一直在上海接受审查，不仅未在“北京被捕”，更不是“去北京‘开会’，从此再未到上海”。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最担心的是上海的局势，因为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基地。粉碎“四人帮”次日，中央首先找了江苏、山东、湖北和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到北京谈话，向他们通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要他们注意上海的动态。10月7日凌晨4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举行的会议结束以后，汪东兴当面交代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要他给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上午来北京，中央领导同志有事要谈。电话接通后，马天水问周局长谈什么事？周说中央领导同志没讲；马天水又问还有谁参加？周说还有上海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马天水还问徐景贤、王秀珍去不去？周答没说要他们来。马天水到北京以后，中央向他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他由于深陷“四人帮”帮派体系而不能自拔，坚持其顽固立场。据当时在场的彭冲回忆说，马天水讲了两点：（一）要求见“四人帮”；（二）希望中央作为党内问题处理。彭冲事后说，“马天水很蠢”。

10月7日，也就是马天水到北京听中央通报的这一天，留在上海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直在想办法打听马天水到北京后的情况。因为中央有规定，马天水不敢往上海打电话，所以联系不到马天水。他们给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办公室打电话也都打不通，找在北京的几位跟他们关系比较深的人，也打听不到消息。一直到晚上11点多钟，文化部的于会泳传来消息，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通知我，告诉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说是华总理定的。”徐景贤听到这个情况后，他联系当天发生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徐景贤这个人很机灵，我后来到上海后，他找我谈话，说了4个小时，很严密，滴水不漏。前几年香港出版了他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我看了，估计他看不到什么档案材料，可能是凭记忆写出来的。8日，徐景贤、王秀珍继续同北京各方面的关系人物联系。最后他们通过关系，接通了京西宾

馆的总机，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他告诉徐景贤，说马天水讲，他身体不好，老胃病又犯了。徐景贤一听到这句话，赶紧派人去找马天水的爱人，问马天水有没有胃病？马天水的爱人说马天水没有胃病。徐景贤马上就意识到真的出事了。徐景贤、王秀珍在意识到北京出事后，就着手策划武装叛乱。当天下午，徐景贤和王秀珍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武装叛乱。晚上，在北京的马天水在中央找他谈话以后，他一回到京西宾馆的房间，就对秘书房佐庭说，搞一个假的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还得研究是大干还是小干？他还说，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是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马天水的这些话，都是他的秘书后来交代的。从马天水所说的这些话看，他当时感到很难办，表态也难，不表态也难，他要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回到上海怎么办，那些“小兄弟”可不好驾驭；他要是不表态，不拥护中央的决定，恐怕回不去。这真实地反映了马天水当时的心态。

10月10日，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紧锣密鼓地策划武装叛乱的重要时刻，中央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武装叛乱的部署。由于马天水迟迟不表态，中央认为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徐景贤、王秀珍走之前，特别交代自己的“小兄弟”，要小心，有事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徐景贤、王秀珍走后，留下的几个常委，如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等人，资历长，有政治斗争经验，他们已从一些渠道了解到“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便假托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再说，将8日常委会上决定的事情拖了下来。

也就在这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国家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和我谈话。我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过去对上海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谷牧一见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命找我们谈话的。他说中央已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现在中央最关心的是上海的情况，所以决定由各部委派一些人，以研究、准备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到上海去。他要我们尽可能地接触各方面的同志，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社会上的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动作，把所了解的情况尽快写信寄回北京，寄到北皇城根立新路9号，有专人处理这些信件，并随时向中央报告。谷牧要我们尽快动身到上海。谷牧找我们谈话后，我们已经买不到第二天去上海的飞机票了，到10月12日，我们才动身去上海。当天晚上，我们一行8人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并住进了国际饭店。第二天，我们先后去了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交组和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了解情况。当时，我们没看出他们有什么大的变动，包括办公室的人来人往也没有大的异常现象。我们只是接触了一些表面情况，也听到一些反映，先后给北京寄了三四次信。我记得，为了以防万一，第一封信没敢在上海寄，是派人到苏州寄的。

针对“四人帮”上海余党妄图发动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的情况，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会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上海党政大权。中央工作组由中央和国家各部委、人民解放军海军、北京市、江苏省派人组成，最多时有226人，加上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约250人左右。中央作出派工作组去上海的决定后，中央领导同志又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明确要求他们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放弃叛乱的企图，把立场转变过来，把上海的工作做好。叶剑英说：上海是大革命开始的地方，上海的人民、工人觉悟高，对“四人帮”的活动如果说以前受了蒙蔽的话，现在则应当看清楚了。你们不能再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没有前途。要站在多数人一面，把上海的事情办好。

在中央领导同志找马天水等谈话后，他们回到上海的当天，也就是10月13日下午4点钟，马天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示。在会议议论中，黄涛（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发言，说就这些能把“四人帮”打倒？！经他这一煽动，会场立即闹开，有人当场叫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叛变。

10月20日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中央工作组主要成员抵达上海，住在海军上海基地。中央工作组当晚即把马天水找去，当面问他从北京回来后做了什么？现在的认识怎样？马天水结结巴巴地回答，从北京回来后，已把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向市委常委和区县局干部作了传达，并印成文件发到基层。群众都起来了，冲击市委，我们已难于工作，现在中央工作组来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保证服从你们的领导。苏振华对马天水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过去你们在“四人帮”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上海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改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中央的通知是：为了加强对上海的领导，中央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在收到中央的通知后，中央工作组按照当时重大事件要组织群众祝贺报喜活动的惯例，决定组织上海市群众祝贺报喜活动，并派我找市委商量落实。我当即从工作组的住地延安饭店到康平路市委书记办公大院直接找到马天水，我对他说了中央的通知和工作组的意见，请市委、市革委会部署通知，接待祝贺地点定在外滩市革委会办公大楼，有关祝贺报喜和群众的游行顺序、交通指挥等，要一并作出妥善安排。马天水表示立即照办。在谈完正事我要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追着问我，你什么时候离开国家计委的？现在是不是在中央办公厅？我说我现在不是在上海吗？他说，我是问你的工作单位？我还是说我就在上海嘛！他不再追问了。过去为了上海引进成套石化化纤设备安排在上海的事，他在京西宾馆开会时曾找过我；1975年10月，我携带李先念的亲笔介绍信，去上海石化总厂检查工程质量，也同他有过接触，他误以为我在国家计委工作。

10月27日，市委召开区县干部会议，传达中央通知，苏振华讲话，我坐在主席台的第二排位置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个书记也坐在主席台上的最后一排位置，马天水正好坐在我的身后。当天的会上已经有许多同志站出来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其中以张承宗的发言揭发最为尖锐。张承宗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市副市长，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并长期负责统战工作。他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要赶做这几万副手铐，要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张承宗把这个问题一端出来，马天水顿时惊慌失措，没办法回答，也不敢回答。因为当时会议上围绕着武装叛乱、篡党夺权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斗争的气氛极为紧张。

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后，在新上海市委的领导下，以清查武装叛乱为突破口，揭发批判和清查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的罪行，夺回了“四人帮”及其余党把持的党政大权，“既搞清了问题，又稳定了局势”。到1977年底，全市各委办、各区县在发动群众、广泛深入揭发“四人帮”及其余党罪行的基础上，查清了全市需要查清的事件300多起，其中全市性的与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重大事件12起。这些事件都得到了认真处理。在揭、批、查斗争中查出的重大事件，被写进中央关于“四人帮”三批罪证材料的有98件，向审判林彪、“四人帮”集团案特别法庭提供证据174件。后来严佑民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彭真的意见时说：彭真讲，上海对“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是彻底的，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上海提供的罪证材料占三分之一。

197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马天水离职审查。1978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在羁押、审查过程中，马天水态度不好，不肯交代“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要害问题。后来随着审查的深入，马天水精神失常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直至确

诊为精神病（属偏执型），按照法律规定，不予审判、收监。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以追究。”之后，马天水在河北老家的弟弟提出把他领回赡养。上海市委经请示中央同意后，批准了他弟弟的请求，让其把马天水领回河北老家赡养。1988年，马天水病故。

□ 《百年潮》 2008年第11期

~~~~~

## 【文革疑云】

### 康生签署的一份秘密处决令

• 王学亮 •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来人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是针对一位79岁高龄、被关押近30年、名叫“卢福坦”的老人的。

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为什么要专门签署命令处决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不容置疑，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公安部的代表还对上海公安局负责人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能不能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

卢福坦已经老迈年高，体弱不堪，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麻烦，如果对这样的老人动粗似乎不太合适。可是又不能违反上级的命令，最后上海公安局采取的办法是，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后再执行枪决。

死去的这位老人名叫卢福坦，曾是中共“五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1932年12月被捕叛变，后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1950年5月被我党抓捕后一直秘密关押在上海。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早年曾作过山东淄川县鲁大公司工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山东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执行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

1928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鉴于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希望中共党内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就在这种精神影响下，武汉三镇的码头工人向忠发一跃而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成为党中央六届一中全会上负总责的领导人。卢福坦也是因为工人出身，和项英、关向应、苏兆征、徐锡根等人一起进入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被王明选中，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员。

1931年开始，王明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常驻莫斯科。同年卢福坦接替了因为闹派性的罗章龙，担任了总工会的负责人。周恩来曾经找卢福坦谈话，宣布他进入书记处工作，成为了实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1932年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关押。根据后来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卢福坦被捕后迅速叛变，其速度比之

前的向忠发还要快。并成国民党中央调查室的候补特务。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而这都在于一个巧合，因为丁惟汾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这件事一直是中共党史中难以破解之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待事实时被提及过。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个人。陈赓对这件事始终没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的是饶漱石。饶漱石看完报告后将报告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

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对调阅卢福坦的交代材料这件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对谢富治后来的调查，康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卢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他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并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从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结，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所以还是没有形成结论。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密调工作，被牵连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 《党史纵横》2008年第10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